

瓜

豆

集

董大中

北岳文艺出版社



八

豆

董大中

北岳文艺出版社

集



瓜豆集

董大中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教育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3.3 千字

1991 年 3 月第 1 版 1991 年 2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

ISBN 7—5378—0499—0

I·477 定价: 5.50 元

自序

我是本不该闯进批评这块圣洁的园地的，像刚刚开始文艺活动那样，一边教着书，一边作点诗，就很不错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心血来潮，写了一篇小文章，题目叫《文艺创作也要搞小土群》。不错，那正是家家后院砌高炉“大炼钢铁”的“大跃进”时代，时间在 1958 年的 12 月初。文章写好了，翻开《山西日报》，那报第三版有一个“笔谈最新最美的文艺”的专栏，已经发表过一两篇文章。我把稿子寄给了它。那时候，报纸处理稿件真快，文艺稿也像新闻稿那样“不过夜”。12 月 6 日，我的稿子见报了。这使我受到鼓舞，当天夜里又写了一篇，又交邮寄去，又很快在 10 日刊登了出来。不想，正是这第二篇文章引起了一些小小的麻烦。

我第二篇文章的题目叫《最新最美——文艺献礼的标准》。献礼，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很明显，这是谈文艺批评的标准的。我为什么要把“最新最美”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呢？说来多少有点针对性。那时，有人已在谈论“两结合”，即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提出把这“两结合”作为文艺献礼的标准。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以为，好作品可以是“两结合”的，也可以不完全是“两结合”的。就以赵树

理来说，“比如《三里湾》，这该算是一部好作品吧。那里边的浪漫主义成分有是有，但，谁能说它是贯穿于全书之始终，又与革命现实主义紧紧结合在一起呢？赵树理在全国解放前写的一些名作如《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等，若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标准去评判，恐怕也会遭到否定的。”我在文章中申述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提出，不要把创作方法与批评标准混为一谈。此文发表以后，我成了一些人的批评对象，至少有两篇文章指责我不该对“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存在怀疑。我想不通。固然，后来听说“两结合”是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的，内部已作了传达，但我自认为我不是谈创作方法，只是说不应该把创作方法当作批评标准，那是两回事。不言而喻，当时在我的内心，创作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

从这以后，我跟文艺批评、文艺理论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然是在业余时间搞，我的主要工作是教书。十年动乱中，也曾写过，但那是令人脸红的东西，只好不谈。粉碎了“四人帮”，我又拿起笔来，并且调到了文艺单位。好像是对以前谈论批评标准的那篇文章受到指责，心有不甘，新时期我写的第一篇比较重要的评论，是《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试谈赵树理建国后的创作》。赵树理，从基本倾向说，他是一位革命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这就是我对他的一贯看法。这篇《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从今天来衡量，也许不怎么好，而且明显带有那个写作年代的特殊印记。我所以把它收到这本集子里，主要就在于它能表现一点我的不甘心。

我想，一个搞文艺的人，创作也好，批评也好，最值得

追求的品质是真诚。有什么说什么，不要言不由衷，也不要吞吞吐吐。赵树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大跃进”年代，他没有写“虚夸文学”，原因盖在于此。我们应该学习赵树理的这种品质，这是我把《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等篇收入这本集子里的另一个原因。以我自己而言，也总是力求说出自己的真心话。有人说，搞评论需要冷静、再冷静。可是我的经验是，冷静了反而写不出文章来。我的文章，大都是在读了作品之后，心里受到冲击，当即写下来的。这就免不了一个缺陷：评价失之偏颇。但我毫不后悔。批评跟创作一样，都不过是审美，创作是对生活的审美，批评是对审美的审美，而审美，就不能没有主观性。可能我的一些批评曾使一些同志感到不舒服，那不要紧，只要把它看作“个人意见”就行了。

收入在这本集子里的，除一篇外，都是我在新时期所写，共分为三辑。第一辑，是对当前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总体考察，大都是近几年所写，稍远一点的，全舍弃了。第二辑是对作品的分析，几乎全是山西作家的作品。所写文章，有的是随感式，有的比较长。其中为义夫小说集《花花牛》所作的序尚未发表，因为小说集还没有付排，但它是今年初所写，理当收进来。尤其因为那篇序文中的一个观点，同《社会的发展与文艺家的天职》、《文学在寻求自己》两篇文章相一致，把它们放在一起，我自己觉得就使自己的想法得到了比较清晰的表现，不至于落入“吞吞吐吐”一流。第三辑里的三篇，是有关鲁迅的。《论“五四”时期的鲁迅》一文，是我特意凑在1979年五月四日那天写的，比《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一篇还早几个月。最末的一篇，写于将

近三十年前。由于新时期以来研究《自嘲》诗的文章大都提到这篇小文，所以特地把它收了进来。谈阿Q的一篇则是为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而写，尚未公开发表过。

这些文章有不少是在《山西文学》、《山西日报》、《太原日报》、《批评家》等报刊上发表的，文末不再注明；凡在外地报刊上发表的，则加以注明。

以上说了这本集子的大概内容。我自己，当然总想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一些新的东西来，但恐怕读者看了，会大失所望，因为个人水平有限。想到可能会有的这个结果，我心中非常不安。

最后要说明的是，进入新时期以来，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赵树理研究上，已经出版了两本著作，发表了三十篇左右的评论和考证文章，合计差不多有七十万字，收入在这本集子里有关赵树理的，只有《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等两篇。由赵树理开始，我注意搜集山西现代文学史方面的资料，发表文坛史料数十篇；近年研究艺术生产力，发表论文数篇；研究电视剧美学，发表长短文章约二十余篇；多年来，还发表过一些文艺随笔：这些，全都没有收进来。所收进来的评论，也只限于文学。这样，内容比较集中了些。那些未收进来的，它们以后的命运如何，很难预料，大约很快就会消失吧。——且不管它。

自己的书自己写序，这叫做“老王卖瓜”，这本书就叫《瓜豆集》。

完了。

1987年的最后一天，深深的夜里。

目 录

自 序 (1)

第 一 辑

社会的发展与文艺家的天职	(1)
打开心灵的空间 进行创造性思维 ——再谈社会的发展与文艺家的天职	(8)
理论批评工作随想	(14)
试论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分野 ——1984年5月23日在一次笔会上的发言	(20)
谈谈评论自由	(33)
文艺批评的春天	(38)
流派作家与“趋从意识”	(42)
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 促使文艺事业不断繁荣兴旺	(47)
时代精神·文学的价值及其他 ——对改革文学的几点思考	(53)
文学在寻求自己	(60)

第二辑

- 山西现当代文学概观 (66)
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
 —试谈赵树理建国后的创作 (104)
“听得懂，感兴趣”
 —简论“赵树理风格” (122)
漫谈“山药蛋派”的现实主义特色 (131)
马烽的幽默 (136)
清明雨滴细无声
 —读成一的小说 (143)
读四位青年作家的小说 (148)
写出人物的心灵美
 —读徐学波的《勇气》 (152)
编稿手记二则 (155)
山西小说创作进展不大的原因在哪里? (159)
《跋涉者》二题 (169)
论成一的心态小说 (176)
评《古墙》 (195)
在关家沟乡的“这块土地上”
 —读田澍中的《山乡咏叹调》 (206)
《山月恨》的魅力 (212)
一个震撼心灵的爱情故事
 —读《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 (220)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读长篇小说《草岚风雨》 (224)

读三篇同题小说《女人》	(228)
读《桥基》印象	(239)
脚手架上的“李向南”	
——读报告文学《上升的脚手架》	(243)
历史的反思与反思中的历史	
——读崔巍的纪实小说《土地悲歌》	(247)
义夫论	
——义夫小说集《花花牛》序	(254)
“晋军崛起”的沉思	
——近年山西小说创作述评	(270)
“山药蛋派”今如何?	(280)
断肠人写断肠诗	
——读石评梅的《扫墓》诗	(288)
新文艺在太原发展的一个实绩	
——介绍《田景福小说选》	(292)

第 三 辑

论“五四”时期的鲁迅	(301)
阿 Q 是一个“国民”	(315)
鲁迅《自嘲》诗小释	(337)

社会的发展与文艺家的天职

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一日千里的变化之中。文艺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文艺应当与社会保持同步。当文艺显得有些落后的時候，我们就不得不检查一下，它跟社会的发展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检查的结果，我们痛苦地发现，问题还是出在我们文艺家的身上。我们的政治敏感不够，不能及时从生活中发现崭新的主题。我们的知识不够，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面对如潮涌来的新事物、新概念、新意识，常常觉得难以认识，更不用说表现了。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不大注意社会的发展给文艺带来了哪些冲击，提出了哪些要求，仍是按照自己过去多年形成的那一套办法、那一套经验，去从事文艺工作。这怎么能行呢？

让我们从电影和电视说起。电影是十九世纪末叶出现的，我国在建国以后逐渐普及开来，到现在，几乎每一个大队、每一个村庄都有放映设备。电影是一种非常普及又非常方便的艺术形式，它一出现，便使其它一些艺术形式受到很大的冲击，特别是戏剧。戏剧跟电影一样，是一种直接艺术，但它的演出就比电影麻烦得多。它需要舞台，一个演出

团体近百号人，吃、住、行都不是说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还有服装、道具等等。电影已成为戏剧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当然，戏剧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是永远不会消亡的，但是它的观众人数，在电影的激烈竞争下不断减少。戏剧要想得到发展，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努力发挥它所独具的优势，发展或创造一些为电影所不可企及的表现手段。笔者看过一些新编的现代戏。它在立意、构思上，在写法上，甚至在语言运用上，还跟几十年前一样。这样的戏是不会有多大的生命力的。

电视的出现，又使电影、戏剧受到更大的冲击。电视是一种新起的新闻传播媒介，又能造成一种艺术形式，即电视剧。如果说电影的放映还需要一定的场合作为条件，那么，电视剧是没有这个限制的，戏剧就更无法跟它相比了。而且，凡是戏剧、电影可以表现的，它也完全可以表现。这就使电视剧处于一种更加优越的地位。电影要想不被电视剧挤垮，现在主要采取法律的手段，就是规定新的影片不能在电视上播映，这反过来促进了电视剧的发展。

电影、电视剧这些现代科学技术的骄儿，对文学也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它把文学作品的不少读者吸引过去，另一方面，又逼使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进行不断地探索和革新。比如我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大都具有很强的故事性，而且大都采用以时间先后为序的叙述方法。那时，我国的电影也是这样。在艺术手法相差不多的情况下，人们自然选择了后者。作家们为了不失去自己的读者群，不得不创造新的艺术手法（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于是，一些同志较多地采用心理描写的手法；一些同志突破了以时间先后为序的

传统写法，而改为时空交错、夹叙夹议。文学上的这些新的手法，在电影、电视剧上也被采用，这又迫使作家们不得不继续进行探索，包括从电影、电视中借用技巧（如“蒙太奇”手法）。其结果，就使文学更加文学化，更加按照文学的规律去进行创作。另一方面，一些读者对这种新的写法不大习惯，而倾向于那种生动有趣的故事，民间文学、侦破小说、武侠小说、人物传奇等等便应运而生，应运而兴。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分野越来越清楚，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从上面的论述还可以看到，文学作品中采用一些新的表现手法，不可简单化地看作“崇拜西方”而予以排斥，那是文学本身发展的要求，是各种艺术竞争下的产物。

再如录音录像技术的推广应用，对一些艺术形式的影响也很大。过去举办音乐会，只能使入场者看到，现在借助录音录像技术，就使那所谓的“时间艺术”，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而这种情况，必然会对艺术提出新的课题。

以上是就科学技术对文学艺术所产生的影响来说的。影响到文学艺术发展的，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是社会审美心理的变化。

自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四化，各条战线都出现了朝气蓬勃、热气腾腾的兴旺景象。生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在改变着人们的审美理想和情趣。王蒙在《漫谈短篇小说的创作》中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节奏，和波音 747 起飞以后在跑道上‘数’地冲过去的节奏，恐怕是不一样的。”《芙蓉镇》的作者古华也说：“人类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明的突飞猛进，加快了人类生活的速度与

节奏。人们越来越讲求效率与色彩。假若我们的文学作品还停留或效仿十七八世纪西方文学的那种缓慢的节奏、细致入微的刻画，今天的诸者（特别是中青年读者）是会不耐烦的。”他们都说到生活的节奏，都主张文学作品的节奏要适应生活的节奏。新近出版的《当代》第五期，开始发表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这是一篇《清明上河图》式的风俗画，又是浓缩一代风貌于一天的当代社会剖面图”（编者的话）。他为什么要把一百年间的生活放在一天二十四小时（是二十四小时还是十二小时尚不清楚，因为后半部尚未看到）的框架里来写呢？其原因之一，就是这样写，可以使小说有较快的节奏，不拖沓，不沉闷。从最近几年的报纸消息来看，京剧已不像先前那样受欢迎了，尤其是青年一代，大都不喜欢京剧。是京剧艺术有所衰退吗？不是。主要是它那哼哼唧唧的声调与文质彬彬的节奏，跟时代气氛不合。跟京剧风格相近的一些剧种也有这种情况，而另外一些激昂、豪放、红火热闹的剧种，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这一点很值得我们的戏剧工作者深思。同样的道理，国画艺术如何革新，也是摆在艺术家面前的重大课题。赵树理在 1936 年发表的杂文《‘雅’的末运》开头写了五种慢节奏——“‘五日一山十日一水’的国画，雪中寻梅闲坐驴背的国诗，走笔比钟表上的指针不很快的国书，捉麻雀式的太极拳，半点钟落一下子的围棋……”国画即为其中之一。固然，我们实行开放政策，跟外国进行文化交流，国画为不少外国人所喜欢，赚回外汇不少。但外国人喜欢我们的国画，仅仅因为它是国画；国画要拥有更多的国内爱好者，也还有一个如何使它适应当代人们的美学兴趣的问题。

跟人们审美意识的演变相联系，文艺上的一些固有观念也在变化。以文学为例。人们对文学的一个最普遍的要求，是在主题上作深入的开掘，从而写出生活的丰富内涵来。这样，主题的固有观念就有发展。过去强调一篇作品有一个明确的主题，这一点，现在显然不够了。周宗奇的中篇小说《清凉的沙水河》尽管存在一些缺点，仍不失为一篇有耐读性的好小说。这篇小说的一个突出成就，就是它写出了生活的丰富性、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而不是简单地回答一个农村专业户可不可以雇工的问题。它的主题是多侧面的，人物也是多侧面的。

对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无疑是党的方针政策。我国的文艺事业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和光辉的成就，正是这一方针指引的结果。本文开头说我们的文艺“显得有些落后”，是相对而言，是跟生活的飞速发展相比较而言的。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既然党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铺设了一条无比广阔的道路，我们要跟上时代，关键便是对前边所说影响文学艺术发展的两个因素能否适应，便要看我们主观上如何努力了。

为此，就必须把自己从因袭的重担下解放出来，使我们的思想站在时代的前列，既要从政治上站到时代的前列，又要从文艺这个专门的领域站到时代的前列。要充分看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自己所从事的艺术部门有哪些冲击，哪些影响，又要从宏观的角度注视着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还要认真研究自己的读者（或观众），研究社会审美意识的变迁。不能不审时度势，仍旧按照自己过去多年形成的那一套办法、那一套经验，去从事文艺工作了。许多事实都说明，

凡是能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的人，他的文艺活动就成功，反之，就进展不大。义夫是五十年代出现的一位作家。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写过一些揭露“四人帮”的小说，都发表了。那以后，他陷入了苦闷，有两三年时间写不出来，几乎要掷笔不干。今年以来连续写了《花花牛》、《春儿》、《花氏小店》等小说，受到人们的重视。义夫的经验，我以为至少有两条。第一条，他对农村的改革十分熟悉，而且是衷心拥护。我们每次见面，他都要喜形于色地描绘农村的变化。这就使他有一种非表现不可的愿望。第二条，他对我国文学事业的进展情况比较关注，读了不少新作，并注意吸取一些新的表现手法。这又使他在表现方法上能够跟上时代。当然，他的基本风格并没有改变，他的作品里仍然洋溢着一种“山药蛋派”的风味。不过那是一种“时新”风味，给人一种强烈的时代感。就是说，义夫的创作是在发展的。那些跟义夫有相同的条件、在创作上却显得进展不大的同志，恐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创作思想上，在写法上，未能下一番“吐故纳新”的功夫。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强调，解放思想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的课题。解放思想，就是要我们跟上时代。我们的时代在飞速发展，我们的社会里充满变革。如果我们不能解放思想，如果我们依然背着因袭的重担，依然迷恋自己过去多年所形成的那一套办法、那一套经验，要使自己从事的文艺事业有一个突破，是难以想象的。

另外，我还认为，不论我们搞的是哪一种艺术事业，搞文学创作也好，作画也好，演戏演电影也好，都必须用很大的功夫，去吸取一切新知识。人类的知识总量正在迅速地成

倍地增加。我们不可能掌握那些特别专门化的知识，但是普遍的新知识却必须知道。农民中的专业户已经越来越多，文艺中表现专业户生活的也越来越多。那些专业户就有不少新知识，你不懂新知识，又如何去表现？如何表现得好？常见有一些具有专业知识的读者投书报纸或刊物，批评一些文艺作品（包括现代戏、绘画、摄影艺术等等在内）中的某些描写，违背了最起码的专业知识，闹出了笑话。新知识、新概念多，这是我们时代的特点。我们的文艺家要跟上时代，这方面就不能显得麻木不仁。

人们都知道，文艺家的天职是创造。要不断创造出新的精神产品来。社会的变化日新月异，文艺家只有紧追不舍，与时代同步，才会不辜负自己的天职，才会不断有所创新。让我们跟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吧。

1984年9月